

##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

### 一 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吗？

抗日战争最大的功绩，一是战胜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二是把中国国家、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了。中国民族很古老，中国随着时代环境进入了自己的近代。抗日战争以前中华民族或中国国家是分裂的，不统一的。中国没有把自己建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国家。

1927至1936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国是双重内战的十年。一重内战，蒋介石和统治集团其他派系间的矛盾对立和战争，人们称为新军阀战争。它们如潮水般汹涌，此伏彼起。1936年王芸生发表过一篇《十年观潮记》，述其颠末。后来有人刊行的《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讲的也大致是同一内容。这种内战打着不同旗

\*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号，宗旨也有不相同的，而首先要求倒蒋则是共同的。再一重内战，是蒋介石剿共内战。新军阀各派的战争时起时伏，剿共内战则十年一贯，从中南打到西北。中国大地上日日夜夜，总有地方是在枪炮轰鸣中度过的。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家分裂，民族不统一的表现。日本侵略者直接制造的分裂中国的伪满洲国、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等还没有列进到这里面。

中国的不统一，分崩离析，看一看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残酷统治压榨下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的分裂、对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举一个例子，1936年《大公报》刊载记者采访豫北冀南几个县报道：那里一县人口的半数归依于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十余种枪会以及秘密流行、仿照宫廷称谓的邪门教等组织。会众跟从传法师念老本咒、止血咒，学分身法、土遁法。枪会而外，股匪遍地，民团四设。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终年劳苦，得不到衣食住的满足，生趣枯竭，达于极点。海洛因等毒品泛滥，梅毒流行，成了乡间的又一特色。到了那里，“仿佛已到世外之蛮邦，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乱世”。报纸随着评论说：“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一切主义政策，皆都会之主义政策，而政治家实业家学者所经营擘画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其持以判断事物，锻炼思想者，要以都会生活为其背景。至于全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易言之，中国之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并

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是也。……吾人单观冀南数县调查报告，实已不胜文明衰亡之叹！”这里所说的“都会政治”，明白点讲，就是外国资产阶级，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盘踞城市，掌握城市人力物力，然后又用它去压迫、搜刮广大农村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城市与农村对立，百分之几的人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对立。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是统一的，是不分裂的。就是这张大城市的报纸也大声发出了“中国文明在哪里”<sup>①</sup>的浩叹。豫北冀南只是一个例子。豫北、冀南在全国并非生产力水平最差的地区。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源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扩张要求，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中国国家分裂，民族不统一更使侵略者看到了希望。战争末期任过日本内阁总理的小矶国昭狂妄宣称，根据中国的地势和历史来看，中国统一是困难的，应该在日本势力之下分成几个地区来统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早就宣传，中国汉族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但还不具备建成近代国家的能力。中国软弱、不统一的一面他们确实看准了。不过中国民族要求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解放自己的更重要的一面，他们却根本没有，也不愿看到。

查考历史，民族统一与国家统一并非一回事。国家统

<sup>①</sup> 张季鸾：《季鸾文存》上册，重庆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5—7页。

一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对内号令的统一；民族统一则主要表示一个国家各阶级、各族人民对外要求、意志的统一。国家统一不等于民族统一了；民族统一则需要以国家统一为条件。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其中有国家政权统一、国内矛盾暂时缓和与民族相对统一的，没有民族真正统一的。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反帝反封建两种斗争并存，就说明没有国家统一与民族统一并存。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各派武装力量统一编入对日作战序列，投入前线作战；国民党政府被各方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来混乱黑暗的农村有些地方很快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国家统一，中国民族统一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出现的一个大变化，大突破。就中国本身来说，抗日战争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切对外战争、包括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大区别，就是民族统一与否这个区别。抗日战争开始实现的民族统一，从往后的发展演变来看，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 二 中国民族统一的力量 来自何方？

中国民族统一与抗日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回答了抗日战争靠哪个力量实现的问题，就回答了民族统一力量来自何方的问题。那段历史虽然过去很久了，人们在认识上

依然分歧对立。

一种看法，认为抗日战争实现，靠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中国之所以能够抗日，就因为蒋介石政权从各方面作了准备。“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正是为了准备抗日。“九·一八”事变以后，蒋政权镇压群众救亡运动，解散长城内外抗日军队，相继订立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也无一非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和积极准备御侮救国的表现。有的持这种论点的抗日战争论著上并引用“外国学人”的文章，证明蒋政权准备抗日的苦心孤诣，认为群众要求抗日是迫使中国走向自杀，中国如果1937年起再坚忍五年不抗日就好了。论者引的“外国学人”——一个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大学生的文章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了五年才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果自1937年起再坚忍五年，日本或不敢和中国作战，所以中国对日抗战是太早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日中国青年怨恨政府容忍日本的侵华政策，正是中国政府切求自存的最好方法。可惜在1931年到1935年有一群大学中学的学生要求政府抗日，并且立即抗日，他们的热情固然值得钦佩，然而迫使中国走上了近于自杀的道路。”<sup>①</sup>至于中国各阶层人士、广大知识分子何以强烈反对蒋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sup>①</sup>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257页，第22页。

要求抗日，据说那是由于野心政客、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他们想利用抗日号召实现自己的野心和目的。一些知识分子只知道学南宋人高唱“满江红”，虚僇激昂，不务实际等等。<sup>①</sup>照这个看法，蒋政权是实现抗日，使民族统一起来的唯一力量。他人莫豫焉。

反共内战是否即是抗战的准备，中国抗日是否抗早了，用不着条举史料去指出其颠倒与谬误。内战、剿共与抗日是不能并行的两件事。内战就不可能认真准备抗日，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抗日战争的实现与坚持，证明了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中国近代历史上充满了各种战争。统治阶级有把对外战争转变为对内战争的，而没有变对内战争为对外战争的。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度中，外国侵略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统治阶级既然与人民处在对立的地位，就必定要依靠外国势力来保护其统治地位，至少要使外国能够容忍，不破坏其统治地位，不然便无法生存下去。蒋政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本质上是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妥协，求得外国侵略者满意，来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年知识分子救亡运动的开始，表现了人民要求抗日和争取民族统一运动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容忍它的存在，蒋政权也就不能容忍它的存在，而要严加取缔镇压。西安事变以

<sup>①</sup>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257页，第22页。

前蒋政府的政策，从剿共到镇压一切爱国运动，都是反对抗日，分裂民族统一，而不是什么准备抗日，促进民族统一。中国果真再迟几年抗日，中国版图上不知还会出现几个“满洲国”，甚至整个中国也会沦为一个大的“满洲国”。此非推论，王克敏、王揖唐、汪精卫等在日本如法炮制下纷纷然不止立过一个“中华民国”，实即再版、三版的“满洲国”了。

又一种看法则认为，抗日战争所以能实现，靠的是人民群众，特别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其他未必都关紧要。蒋介石怎么由不抗日变为抗日的？不是由于西安事变吗？西安事变把蒋介石逼上梁山，他只得被迫答应走抗日一条路。红军北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又是西安事变能够出现的前提。所以说，抗日战争、中国民族统一的实现，主要是靠共产党的斗争。

诚然，共产党的斗争推动，是事情的重要部分，但决非事情的全部。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11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就在这年11月，蒋介石一方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联系，考虑政治商谈。陈立夫在台湾发表的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记载了这种联系。<sup>①</sup>1936年1月经过宋庆龄的活动，连续了十年武装对抗的国共两党，重新开始对话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

---

<sup>①</sup>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变，共产党事先并没有与闻。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处境十分危殆，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不少地方实力派系以前曾有反蒋历史，而且遭受过失败打击。西安事变发生应该是他们谋取自身利益，倒蒋夺权的好机会。但他们这时权衡利害，有态度暧昧的，却没有主张倒蒋分裂的。这一些，都不是共产党单方面所能为力的。

然则，抗日战争、民族统一实现的力量来自何方呢？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颠倒基本事实或者把事情过于简单化，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应当说，这个动力是来自中国阶级关系大转变，来自中国民族的觉醒。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以后，又很快开始了分裂华北五省的活动，并力图使它的政治、经济势力进一步向全中国扩张。中国广大阶层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民族危机的压抑，感到灾祸临头。形势是这样严重，一场暴风雨的冲击倾注已经不可避免了。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发生的。蒋介石原来反对抗日，但他毕竟在民族灾难大风暴来临时转变过来了。这种转变决非简单地是他个人态度的转变。在如此大关节上，并不最后取决于他的个人态度。他周围酝酿着强烈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不改变不行。他在这个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身不由己。他的态度改变，是全国阶级关系形势的重大转变。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经过历次斗争，加强了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系的控制。南京政府在中国大部分版图上建立起了相对的统一。南京政府由英国协助，实行币制改革



等，也加强了统一的经济能力。蒋介石成了那个统一力量的领导者。这是事实。没有蒋介石政权的参加，就谈不上全国的抗日行动，中国民族就仍然是分裂的民族。蒋的转变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旧篇页的重复，而是新篇页的谱写。这不是蒋介石个人有何神通，而是由于他是一个掌握了极大国家权力、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愿望、那时甚至无人能够取代他的地位和作用的个人。他的态度如何，对事情就不大相同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血战十年，由打倒蒋政权改为“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是阶级关系重大转变的又一个突出方面。红军从江西到达陕北，国民党从不同渠道得到情报，说共产党只有“七千人，三千枪”。其实共产党的力量决非单单是武装的人数。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从孤立封闭状态中走出来，同全国要求抗日的社会阶层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分析时局，发表主张，说明民族矛盾是这时的主要矛盾，民族利益是这时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利益。这些言论主张很快传播到知识群众中去，为一部分人所接受。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中国阶级关系的大转变，中国民族觉悟的提高，使全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全民族的统一于是也就实现了。

人们的认识各不相齐。关于中国民族统一如何实现的，它有何意义等，排诋难通之说，至今时有所闻。我们知道，在日本，在事变刚刚过去时，日本言论界出现的一场争论中，一些人就已经把事情看得很明白了。那场争论发生在1936年秋至1937年8月，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

都在评论之中。其背景是，日本统治势力中一些人对于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看法分歧。有人认为，南京政府正在成为中国的统一政府，为了对苏联奋战，日本今后应该跟南京政府谈判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另外的人认为相反，日本只须跟以往一样，对中国分割统治。1936年秋，陆军部某参谋发表《支那的统一倾向与日本对支那之再认识》一文，就提出前面那种主张。然后，近卫文磨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尾崎秀实、天津支那问题研究所的中西功以及小川爱次郎等也发表文章，对蒋政权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1937年2月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支那问题之所在》，关于所谓支那问题的再认识争论进入高潮。文人们的纸上议论尚在继续，日本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卢沟桥日军的枪炮声最后作出结论了。在那场争论中，尾崎秀实、中西功、小川爱次郎等人讲的一些论点是很值得重视的。他们说：“事实上，与其说中国走向统一，不如说正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关头。”<sup>①</sup>过去蒋介石政府“背离群众的道路”，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如果不与群众道路产生一定的联系或关系，就无法维持政权，“这表明不是走向蒋的独裁和群众不自由的方

<sup>①</sup> 大村达夫（中西功）：《支那问题的所在》，天津《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第4号，见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论争的一个侧面》，载〔日〕《历史学研究》1972年第12期。

向，而是改造国民党，开始部分地给予群众以自由”。<sup>①</sup>卢沟桥事变以后，“从一个民族抵抗来说，即使它离开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会进行，而且也不用顾虑外国的干涉”。<sup>②</sup>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上不是国民党政权，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国民党政权虽然被这巨大的民族运动浪潮所推动，然而它本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而且，最近事态的发展表明，如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浪潮冲垮。”<sup>③</sup>“现在恐怕日中两国的很多人，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它必将作为一桩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我们面前。”<sup>④</sup>“华北问题现已成为整个支那问题。而且，我们所最重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支那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的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sup>⑤</sup>“国民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并不是多么了不起

① 大村达夫（中西功）：《支那社会的基础范畴与“统一”化的关系》，《满铁调查月报》1937年8月，第62页，见同前。

② 大村达夫（中西功）：《日支事变的第二阶段与国民政府》，《满洲评论》第14卷第1号（1938年1月），见同前。

③ 尾崎秀实：《西安事变以后的新形势》，《尾崎秀实著作集》第1卷，日本，劲草书房，1987年版，第147页。

④ 尾崎秀实：《华北问题的新阶段》，尾崎秀实：《现代支那批判》，日本，中央公论社，1937年版，第117页。

⑤ 尾崎秀实：《华北问题的新阶段》，尾崎秀实：《现代支那批判》，日本，中央公论社，1937年版，第127页。

的问题，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sup>①</sup> 抗日思想和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正在四亿民众中迅速生长。“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的势力所能长期压服的”，“现在日本帝国真正面临着兴亡歧路的选择”。<sup>②</sup>

50多年以后回头来看日本那些中国问题研究者当时讲的话，不能不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国民族统一在中国争取独立、民主的力量推动下实现了。中国民族统一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它的重大意义就在日本侵略者现在面对的不是蒋政权代表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民族。日本把自己摆到了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地位上，走上了覆亡歧途。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其最后根据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在分析中说的“四亿民众的觉醒，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的力量所能长期镇压得了的”，这个论断更带有普遍和长久意义。

### 三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斗争 何以没有导致民族分裂？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统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

<sup>①</sup> 尾崎秀实：《华北问题的新阶段》，尾崎秀实：《现代支那批判》，日本，中央公论社，1937年版，第128页。

<sup>②</sup> 小川爱次郎：《华北事变的真相及其对策》，转引自井上清、卫藤沈吉：《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日本，原书房，1988年版，第275页。

立斗争并没有结束。它们之间这时的矛盾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主要不表现在武装对峙上。中国抗战的阵营能够坚持和运转，这是关键的一环。但是抗日战争使一切都在迅速变动中，国共矛盾对立也由其他形式恶化为武装摩擦与对峙的形式，而且几次爆发危机。如果那种危机不能及时制止，就有可能发生国共分裂，并导致民族分裂，抗日夭折。当时人们不止一次担心过这种分裂和夭折。

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文献把那几次危机叫做第一、二、三次反共高潮。那是从国共两党关系来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重点在华北。经过斗争，国民党势力退出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第二次重点在江南，即1941年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人被消灭。第三次重点在陕北。国民党30万大军密谋闪击陕甘宁边区，被共产党揭露未能实现。其中皖南事变引起的震撼最为强烈。共产党连续提出两个十二条，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销反动命令，惩办祸首，并针锋相对，宣布“何反我亦反”。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新华日报》等单位紧急行动，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八路军决定从华北抽调兵力南下，支援新四军。共产党内有人认为这是又一次“四·一二”，国共要全面分裂了。有关国家也纷纷表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避免逼成事变。美国总统罗斯福派行政助理居里来华了解情况，居里会见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苏联

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询问。<sup>①</sup>在危机缓和以后，国共两党也没有停止它们间的对立和争论。

现在我们知道，双方的斗争，从已经发表的各次谈判纪录来看，主要是关于国共两党以何种方式建立联系、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可以扩编为几军几师等问题。它们的矛盾、斗争，可以归结为国民党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与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限制的斗争。但是仅仅如此看待，就可能缩小了事件的意义，也不能说明斗争何以那样尖锐。国共两党谈判中没有讨论、事实上也无法讨论的是，抗日战争中是否需要和施行那些民主改革、特别是在农村关系上是否需要和施行那些民主改革的问题。在抗日战争进行的同时，实行怎样的社会政策，这是造成双方斗争尖锐化的一个焦点。蒋政权为了维护自己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共产党主张民主改革，并且一开始就在抗日根据地施行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个阶段论，这是错误的。”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

---

<sup>①</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491—492页。

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sup>①</sup> 事实就是这样，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二者密切相关。西方有眼光的评论家当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国共两党的一致与矛盾对立，是在民族独立上的一致，在民主革命上的对立。蒋政权反对民主改革，即站在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对立面，它们的斗争因此就不能不是非常尖锐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性质由日本加给中国的民族压迫最后规定了，不可能改变。但不能由此就认为它的内容那么单纯，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力量对比在改变，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力量对比也在改变。它们的性质各异，进程相同。看到了后面这一条，才看到了抗日战争引起的深层的社会历史变革。

国共两党的对立斗争何以又没有导致抗日阵营的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以又终于坚持到底了呢？

道理就在于中国民族这时是在两个矛盾中运动行进的。一个民族矛盾，一个国内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立。中国受到日本全面武装进攻的那个外部条件一天不改变，国内阶级矛盾就一天要受到那个条件制约不会改变。国共双方一面争论对抗，一面又遵守着基本的共同规则。例如双方尖锐的思想舆论斗争不断，高层的谈判也不断。双方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一版，第1078页。

指斥批评对方，各自无例外地要高擎抗日旗子。共产党指斥蒋政权破坏团结，消极抗日；蒋政权则指斥共产党不服从政令军令，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双方在斗争中走一步看一次，保持一定位置，不一次走得太远。共产党很注意在反击中有理有利有节，“节”就是不要让全局遭到危害。蒋介石主观上是抗日、反共并重，甚至反共重于抗日。皖南事变以后他对居里说，中国抗战，一为抵制日本侵略，一为阻止中国赤化。再早一点，他对到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等人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的这个愿望至死也不变的”。<sup>①</sup>照这些说法，他主观上至少是把抗日与反共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却并不能按照抗日、反共两个第一去行事。他并不能同时骑在两匹马上，他不能为了反共而卷起抗日旗子。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这是社会历史形成的客观法则。为什么国共斗争没有导致抗战分裂，就是他们都要受这个规则的制约。他们作为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共同遵守了这个规则。

<sup>①</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34页。



当社会生活矛盾引起人们酝酿着强大的要求改变社会现状愿望的时候，那种愿望一定要得到满足，成为改变现实的一种推动力量。抗日战争前的阶级关系转变就是这样实现的。同样地，当社会生活矛盾引起人们强烈要求保持住与大多数人利益攸关的某种秩序、状况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足以阻挡洪水冲击的堤坝，使社会生活在一定秩序、轨道上运转，而不致突然崩溃。抗日阵营的团结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根据和条件不变，矛盾和斗争的性质也就不变。中国民族统一起来了，它正朝一定的方向运转下去，摆动不会超过允许的幅度。

#### 四 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与 抗日战争的关系问题

抗日战争一旦胜利，中华民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原有的促成统一的外部条件改变了，这时它发生了走向何种前途的问题。中华民族现在面临着三种选择：（一）国共继续合作，中华民族大体上保持抗日战争中又统一又矛盾的状况。（二）在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统治下，民族重新陷于分裂，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老路上去。（三）由共产党领导，实现新的持久的民族统一。第一种，共产党准备实行。日本投降以后，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又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说，国民党“在内

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sup>①</sup>但国民党蒋介石不接受。第二种，国民党蒋政权坚持要实行，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反对。第三种，经过四年解放战争，最后选择了新的民族大统一，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民族大统一。

中国新的民族统一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它的秘密要从抗日战争中去寻找。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国民党都有自己与民族统一问题有关的纲领，但彼此对立，很难找到共同的地方。这只需看一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一切都清楚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上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在经过论证以后，作者说：“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sup>②</sup>，关键指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8页。

了，那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针锋相对。《中国之命运》上写道：“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必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中国“惟有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至于共产党呢？作者这样说：“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害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装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它政治进入轨道的？这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sup>①</sup>照这样的断言，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的前途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为“总枢纽”、“大动脉”指向的前途命运，任何其他思想理论、政治力量指出的前途命运都是不应该有，也不允许有的。

两个纲领，两条道路，两种前途命运，找不出中间办法。拒绝顺着共产党指出的路走下去，就只有顺着国民党

<sup>①</sup>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七章。

蒋政权指出的路走下去。然而那是民族分裂，历史倒退。历史终究没有倒退下去，关键又在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为往后的中国大前进做了准备，从而也就为中华民族新的统一做了准备。

抗日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力量一系列显著变化。它们是：（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了。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总共三万多人，革命根据地只有人口150万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不承认与共产党合作，把它们间的谈判、交往说成是投降收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北连长城，南至海南岛，人口一亿，军队100万，民兵200万。国民党也要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了。有的论及抗日战争的出版物上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坐大”了，那是谬说。共产党的力量发展了，首先它是在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的。敌后是日军枪炮刺刀血腥统治下的地区，斗争极其残酷。谁“坐”了，谁不但大不了，而且马上要被消灭光。共产党领导人民顽强斗争，不断收复失地才大起来了。人民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失地越多，日本占领中国的土地就越少，中国收回的国家主权、光复旧物就越多。这怎么算是“坐大”呢？共产党在全国的地位提高了，也不是“坐大”得来的。它处在国民党蒋政权罗网严密控制与层层军事包围之中。国民党为此制定过种种办法和计划，下达过各种命令。如果共产党不是靠积极抗日，受到人民的拥护，也早就被消灭了，何能“坐大”！（二）国民党蒋政权的力量

由强转弱，独裁统治行不通了。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蒋政权统治中国的全部 22 年里，这时达到了黄金时代。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发展起来，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 年日军先后在豫南、中条山发动进攻，消灭汤恩伯、卫立煌两个集团军以后，华北和中原的广大地区，再没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了。据统计，1941 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以 306 个师与日军 11 个师团对峙，几乎 30 个师对日军一个师团。单是计算第一线兵力，也为 22 个师对日军一个师团。宜昌作战是国民党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起的进攻战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至 1943 年，国民党中委投敌 20 人，将领投敌 58 人，几十万部队变为伪军。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内战，蒋政权反其道而行之，人心大丧。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装备起了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庞大军队，但要凭它把人民镇压住，不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去推翻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三）中间势力兴起。中间势力来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他们要求抗日，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承认共产党应当保持武装力量，自主斗争。最初他们的活动是分散的，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1941 年 3 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把中间势力集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所有第三种力量在内的政治联盟。中国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

之间有自己的纲领的政治联盟。中间力量经过分化，政治上从中间走向靠左，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成了共产党有力的同盟军。蒋介石陷于孤立了。所有这些变化，是抗日战争开始时所无法预测的。正是这些变化规定了抗战胜利以后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面貌和结局。这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多次数反侵略战争，它们的环境条件各异，作用也不相同。惟有抗日战争在其中占着特殊的位置。抗日战争是这样一种战争：第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民主革命；第三，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新的统一前途的斗争。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不止同时是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同时又是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统一前途的严重斗争。民族解放，民主改革，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统一，它们结合在同一个过程里，“三位一体”。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显得格外激烈复杂，引起的社会关系、政治力量之间的变动格外显著。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全局，就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所在。人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看做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一类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必须认识它是一个自成段落的历史时代。

中国今天的民族统一，我们说它是新的统一，是由于它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制度基本上改变了。长达100年遭受外国侵略压迫的民族，变为昂首阔步独立于

世界的伟大民族了。以前内部的四分五裂，如今由高度的统一所代替，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一致了。这种新的统一也就成了一种持久牢固的统一。我们的面前还有任务要去解决：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大陆台湾统一要由一国两制去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实现，要靠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去解决。从抗日战争中我们了解了中华民族运动的过去，同时也就可以预期它的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继续兴起的潮流不可抗拒，就像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潮流一样不可抗拒。